

科舉

科舉導論

吳根洲



編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科举导论

吴根洲 编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举导论 / 吴根洲编著.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40-0867-6

I. ①科… II. ①吴… III. ①科举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9057 号

科举导论

吴根洲 编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刘成军

责任校对 余 宏

封面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867-6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言

科举制度萌芽于汉，创设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鼎盛于明，至清代盛极而衰，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止，历时一千三百年之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科举对中国的社会、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影响面之广，影响力之深，超过任何一项典章制度。科举不但决定了应举者个人的前途、命运，家族的兴衰，还左右着当时的教育，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士风和文化，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婚姻观念以及社会心态。隋唐至明清的小说、诗歌、散文、戏曲和民间文学的绝大多数作品或直接或间接与科举制度有关，可以说，科举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长盛不衰的题材。科举制度深深地渗透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每个细胞之中。然而，科举制度在反帝反封建的近代历史洪流中被塑造成为一个罄竹难书的恶制，以至于在今天仍是一个被广泛误读的制度。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有学者开始冷静、客观地面对科举制度。2005 年，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在《书屋》发表《为科举制平反》一文，更是让科举制度瞬时高调地进入大众视野，以科举为研究对象的“科举学”也逐渐成为 21 世纪的一门显学。

综观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人们从激情批判逐渐转向理性判断，科举学逐渐从“险”学变成显学。然而，科举制度的牵涉面太广了，人们

对科举制度的成见也太深了。提及科举，绝大多数受过现代教育的非专业人士心目中浮现出来的仍多是僵化的“八股文”、悲凉的“范进中举”、花样百出的“科场作弊”等负面场景；在多数老年人头脑中，科举更多的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状元戏、“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赶考戏。实际上，科举在废止百年之后仍然时时萦绕在今人生活周围，只是许多人并未意识到罢了。比如，时下火爆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借鉴了西方文官考试制度，而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却是受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启发而创制。每年疯狂炒作的高考“状元”一词，也是一个来自科举制度的重要术语。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还常见一些不明就里的科举术语误用现象。比如把前三名误称为位列“三甲”，明清科举考试的殿试结果分为一甲进士三名、二甲进士若干名、三甲进士若干名，前三名称为“三鼎甲”，位列“三甲”的进士绝不可能是前三名。又如把考试最后一名戏谑为“坐小椅儿”，明清在生员也就是秀才的选拔考试中，最后一个被录取的名字下面会打一个红色的“√”作为标记，这个秀才坐的却是一把幸运“小椅儿”。

相对于科举制度丰富的内容和深远的影响来说，已有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而且描述性的成果相对偏多，基于史实的分析性成果偏少，若要改变大众对科举的成见还需要合适的载体、平台。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高等教育。如果把科举研究的成果通过课程传播给大学生，假以时日，长期戴在科举制度头顶上的“恶谥”就有可能被摘掉，科举就可以从一个“贬义词”逐渐变成“中性词”而得以还其本来面目，这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弘扬传统文化，接续民族历史，既是青年大学生的必备修养，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因此，在现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并形成通识课程教材，为广大青年学生呈现一组全面、客观的科举常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育行为。

科举含义广泛。首先，科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作为一种选官制度

的广义科举始自西汉的察举，狭义科举始自隋代创制进士科，如不做特别说明，科举一般取狭义概念，本书也是如此。其次，科举有文科与武科、常科与制科之分，本书探讨文科举而基本不涉武科举，以常科为主而兼涉制科。再次，历史上不仅隋、唐、宋、元、明、清等全国性政权施行科举，五代十国、辽、金、太平天国等地方性政权也曾实施，甚至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也模仿中国长期实行科举制，限于篇幅本书仅以中国全国性政权实行的科举制度为探讨对象。此外，本书也把与科举密切相关的朝考制度纳入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并非仅把科举作为一个孤立的制度予以呈现，还用相当的篇幅剖析科举制度在社会运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与社会系统的关系。

本书采用专题式研究，兼顾历史演进的线索，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强调理论分析和学术性探讨，史论结合；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相统一；定性判断与定量实证研究相结合；兼顾研究的学术深度与受众的学习特点，力图较为清晰地揭示科举制度运行的基本规律；尽力廓清专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呈现出科举作为一个制度的有机整体性。第一章直面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科举固有的成见，用历史的真实与严密的逻辑论证科举选拔出来的是“人才”而非不中用的“样子货”。第二章从科举不断演变、完善的过程来说明“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基础，同时向读者初步交代一个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科举制度全貌。第三章运用现代测验理论分析科举制度的科学性，同时回应有关科举考试偶然性的质疑。第四章分析科举时代人们刻苦攻读痴迷应举的动力。第五章梳理社会关注度极高的科举制度如何成为人们高度认可的公平制度。第六章描绘人们高度认可的科举制度塑造出一个如何独特的科举社会。第七章剖析体现科举社会特征的科举家族现象。第八章则着重于科举制度评价，从科举的正负功能、科举的存废之争、科举的历史地位等维度梳理人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笔者从对科举制度产生兴趣到尝试进行科举研究已有十年，中间撰

写了几篇有关科举研究的学术论文与随笔小论并得以发表。自 2008 年以来，每年均在高校开设《科举文化》通识课或专业选修课。此书虽得以完稿，但距离自己的期望尚有很大的距离，错漏不当之处还望读者予以指正，笔者不胜感激！

吴根洲

2016 年 2 月

目 录

第一章 科举人才论	(1)
第一节 状元是样子货吗	(1)
第二节 清代状元的成就	(11)
第三节 科举人物及延续	(24)
第二章 科举演变论	(33)
第一节 从察举到科举	(33)
第二节 科目的单一化	(51)
第三节 层级的复杂化	(61)
第三章 科举科学论	(78)
第一节 科举考试中的偶然性	(78)
第二节 明清会元的殿试名次	(98)
第三节 解元考中进士的概率	(109)
第四章 科举动力论	(119)
第一节 丰厚回报与生活所需	(119)
第二节 社会优待与家庭氛围	(140)

第五章	科举公平论	(152)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程序公平	(152)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实质公平	(174)
第六章	科举社会论	(195)
第一节	门阀社会到科举社会	(196)
第二节	科名崇拜与科举风俗	(210)
第七章	科举家族论	(227)
第一节	科举对家族的影响	(228)
第二节	科举家族形成过程	(241)
第三节	皇权控制科举家族	(251)
第八章	科举评价论	(265)
第一节	科举的正负功能	(265)
第二节	科举的存废之争	(279)
第三节	科举的历史地位	(294)
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25)

第一章 科举人才论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绵延 1300 年，对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的影响至深至巨。科举制度是通过考试的方式把读书人选拔出来，作为官员的主要后备人选，发展到明代，朱元璋更是提升到“非科举，毋得与官”^① 的高度。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用意是提高官员的素质，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胜利者当可谓科举人才。具体而言，各级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生员、举人、进士都是科举人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都期望通过科举选拔真才为封建政权服务，雍正帝曾说：“乡、会两闱，乃国家抡才大典，必须防范周密，令肃风清，始足以遴拔真才，屏除弊窦。”^② 乾隆帝亦提出：“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③ 然而，科举人才在今天许多人的心目中却不是什么人才，而是范进、孔乙己之类迂腐的儒生。那么，今人该如何评判封建王朝选拔出来的科举人才呢？

第一节 状元是样子货吗

状元，在科举时代被看作“一科之长，文运所系”，也是科举阶梯

① [明]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一《科试考》一。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雍正十二年二月癸亥条。

③ 《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九《搜检士子》。

中最为荣耀的科名，向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中国的传统戏曲中，状元更是成为科举制度的象征，民间不少人甚至把科举直接理解为“考状元”。受清末废科举及后来“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舆论影响，许多人怀疑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只会应付考试，只懂四书五经，只会写八股文，甚至有人把状元定性为没什么真才实学的“样子货”。时至今日，这种认识仍旧固化在许多人的意识之中。

一、两份名单

有一位作家在一篇文章中列出了两份名单，调查了大众对名单上人物的熟悉情况，进而得出科举考试考出来的状元也可能成就平平的结论。这篇文章后来被几十家杂志转载或“加工”后再发表，有的文章甚至试图给人以“状元反不及落第秀才”的印象。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份名单：

第一份：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王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第一份名单里的人物，绝大多数都不为人所知，第二份名单里的人物，绝大多数却为人耳熟能详。紧接着作者指出第一份名单里的9个人都是清代科举考试的状元，第二份名单里的9个人却都是清代的落第秀才。结论似乎一目了然。

我们再来看看两份当代人的名单：

第一份：吴文俊、黄昆、叶笃正、闵恩泽、吴征镒、徐光宪、孙家栋、师昌绪、谢家麟。

第二份：韩寒、郭敬明、姚明、赵本山、丁俊晖、冯小刚、张艺谋、郭德纲、周杰伦。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对第一份名单里的人物陌生，而对第二份名单里的人物熟悉。要知道，第一份名单中的9个人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国家级奖项2000年设立，每年最多授予两个人，国家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们隆重颁奖。第二份名单里的9个人中最高为全日制本科毕业。试问，能不能认为第一份名单里的人成就平平呢？回到主题，能不能得出这些科学家所接受的教育、所经历的考试“有问题”这样的结论呢？

实际上，顾炎武、吴敬梓、洪秀全等人的高知名度与这些历史人物进入了中小学教材密切有关。韩寒、丁俊晖、周杰伦等人的高知名度与他们频频在大众媒体亮相密不可分。如果提起王选、袁隆平，同样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知名度就会高出许多。张謇、翁同龢，也是清代科举考试的状元，却是声名在“今”。因此，拜各种各样媒体所赐的知名度并不一定与其成就呈正相关。9位著名科学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绝对是大名鼎鼎，业内人士闻之肯定是如雷贯耳。同样的道理，9位状元在各自领域里同样也留名青史。只是隔行如隔山，若不通过大众媒体的介绍，他们很难被“外行人”关注罢了。

所以说，大众熟悉与否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成就大小的标准。

二、如何认识两份名单中的状元

“状元”一词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正式称呼。实际上，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绝非易事。读书人在考取状元的征途中要经过层层筛选：第一步，通过县试、府试、院试，考取生员，俗称秀才；第二步，生员经过科试取得参加全省统一考试——乡试——的资格，若生员被选为贡生或优秀的读书人捐为监生可以经过录科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乡

试中式者称为举人；第三步，举人赴京城参加会试，中式者才能参加殿试，殿试之后获得进士功名。进士分为三等，一甲进士仅有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由此可见，状元是通过科举考试一级又一级的选拔而产生的超级“学霸”。最终是否考取状元可能会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是，状元一定是具有深厚的学养和功底，具备相当的文学才华和经史造诣，拥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和耐力的佼佼者。历代状元中不乏青史留名的耀眼人物，即使上述名单中不为普通民众所了解的清代状元也绝不是平凡之辈，个别状元甚至还是某些领域的精英。

傅以渐（1609—1665），字于磐，号星严，东昌府聊城县（今山东聊城）人。清代知名学者、史学家，在清初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史稿》有传记。傅以渐于顺治二年（1645）考中举人，顺治三年龙飞首科状元及第，被授予内翰林弘文院修撰一职，后历内翰林国史院侍讲、左庶子、翰林秘书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而擢升内翰林国史院学士。顺治十一年，授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官至宰辅。顺治十二年，加太子少保衔。顺治十一年皇太后患病时，傅以渐代顺治帝处理政务，堪称顺治时期的贤臣和干臣。傅以渐著述甚丰，先后担任《明史》《太宗实录》的纂修，《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以及《通鉴》的总裁官。

王式丹（1645—1718），字方若，号楼村，扬州府宝应县（今江苏宝应）人。江宁巡抚宋荦组织编选的《江左十五才子诗选》把王式丹列在首位，《清史列传》也为王式丹作传。王式丹还是秀才的时候就在海内享有重名，无奈命运不济、差池晚达，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才考中举人，四十二年又连中癸未科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但年已59岁。考中状元时的年龄又称魁龄，王式丹是清代魁龄最大的状元。但凡大著作，同馆者均推举他执笔，然而因年老耳聋，得不到康熙帝的重视，只能做幕后英雄。他一生嗜学好古，史称王式丹的诗“排奁陡健，一洗吴音啾缓”“其征材之奥博，使事之精核，运以排山倒海

之气，琢以炊金馔玉之词”。王式丹有《楼村集》25卷传世，参与修纂《皇輿表》《佩文韵府》《一统志》等。在当了10年的修撰之后因病归乡，却又受同科榜眼赵晋江南科场案的牵连，以垂老之身反复对簿公堂，三年之后才不了了之，两年后即去世，可谓坎坷终生。

毕沅（1730—1797），字纘衡，号秋帆，太仓州镇洋县（今江苏太仓）人。毕沅一生著述极丰，有几百卷重要的学术著作，《清史稿》有传记。乾隆十八年（1753）毕沅中顺天乡试举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状元及第，自翰林院外放甘肃巩秦道，历陕西按察使、布政使与陕西、甘肃、河南等省巡抚，最后官至湖广总督。为官从政之暇，毕沅辛勤笔耕，著作等身，史载“虽官至极品，铅槧未曾去手”。乾隆三十七年，毕沅广延英俊，博稽群书，历时20年，完成了长达220卷的《续资治通鉴》这部浩瀚巨著。梁启超称道该书说：“盖自此书出而诸家《续鉴》可废矣。”毕沅是一位经史子集无处不熟的通才，除了在古籍整理上的成就外，尚有《灵岩山人诗集》44卷、《经训堂文集》40卷传世，亦有文名，并入选今人之《辞海》文学分册。

林召棠（1786—1872），字爱封，号芾南，高州府吴川县（今广东吴川）人，是清代广东省三位状元之一。嘉庆二十一年（1816）林召棠考中顺天乡试举人，道光三年（1823）参加癸未科殿试，道光帝用朱砂笔批其卷：“今科得一佳元，一字笔误偏旁，非关学问”，被钦点为一甲第一名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林召棠不恋官场，为官仅数载即辞官归乡，先后主持广雅书院、肇庆书院，弘扬文化培育人才，为当地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居家50余年，是清代年寿最高的状元。林召棠尚气节，淡泊名利，为官清廉，支持林则徐虎门禁烟。他工诗善书，诗律严谨，书法造诣很深，自成一家，著有《心亭亭居诗存》《心亭亭居文存》《心亭亭居笔记》等著作。

王云锦（1657—1727），字海文，号柳溪，榜名施云锦，又名顾云锦，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无锡）人。王云锦8岁可以吟诗，12岁能

够作诗，从小就有“骏马心雄骋锦程”的壮志。王云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考中举人，直到康熙四十五年才考中丙戌科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当时他已经 50 岁。康熙四十八年，任会试同考官，后又出任陕西学政。任官期间，王云锦参加编纂《康熙字典》。康熙五十七年，再任陕西学政。有《秋林集》传世。

刘子壮（1609—1652），字克猷，号稚川，黄州府黄冈县（今湖北团风）人。在明代崇祯三年（1630）就考上了举人，后来又寒窗苦读近二十年，才于清代顺治六年（1649）考中己丑科进士一甲第一名，大魁天下。刘子壮殿试策论洋洋万言，略谓二帝三王治本于道，道本于心，讲学为明心之要，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又言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一时为士林传诵。顺治九年担任会试同考官，考试结束，告病还乡，不久就病逝了。刘子壮虽然官仅翰林院修撰，但他博综群籍，精通八股文，才气过人，文名远扬，是“顺康四大家”之一，与同科一甲第二名榜眼熊伯龙齐名，世称“熊刘”。有《岷思堂集》传世。

陈沆（1785—1825），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黄州府蕲水县（今湖北浠水）人，出身于下层官僚家庭。于嘉庆十八年（1813）中举，后于嘉庆二十四年中己卯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道光初年曾先后担任广东乡试正考官、会试同考官，最后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陈沆学问渊博，长于诗文，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清史列传》有传。陈沆的诗较富有现实内容，反映了嘉庆年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朝城》《河南道上乐府四章》《濮州道中》《兰阳渡》等，揭露了当时吏治之腐败，民生之凋敝，作品贯穿着作者济世悯民的胸怀。陈沆的诗既不墨守古人，也不随俗转移，其诗造意刻苦而出以自然，语言琢炼而达于质朴，才情流溢而气韵沉深，流传至今的有《简学斋诗存》4 卷、《简学斋诗删》4 卷，共收诗 360 余首。陈沆也入选今人之《辞海》文学分册。

刘春霖（1872—1942），字润琴，号石云，河间府肃宁县（今河北肃宁）人。刘春霖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他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刘春霖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不久就被派往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回国后历任咨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刘春霖一度隐居家中，在袁世凯、徐世昌、曹锟当大总统期间，先后任总统府秘书帮办兼代秘书厅厅长、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职务，两次代表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并因此名噪一时。“九一八”事变后，刘春霖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保持晚节，坚辞不就“满洲国教育部长”“北平市市长”等伪职。

可见，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状元大多是很有作为的，根本不是什么迂腐无用的“样子货”。

三、如何认识两份名单中的秀才

汉代察举即有秀才一科，为优秀人才之意，东汉年间，为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南北朝、隋代之间，秀才科为科目之最。李唐初期，把秀才列为常科之首，由于录取的人数非常少，尤其贵重难得，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停废。从明代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通过童试（县试、府试、院试的统称）方可取得入学资格，即成为“生员”，俗称为秀才。秀才虽然只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的功名，但是，明清时期考中秀才的平均年龄在24岁，竞争相当激烈，尤其在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获取秀才功名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读书人考中秀才就代表可以正式从事文化人的工作：进，可以接着考举人、进士；退，可以充当教私塾的先生。经过激烈竞争脱颖而出的秀才，具备了较

高的文化水平，科举时代的许多秀才在文学领域、学术领域大有作为，甚至青史留名也并非稀奇的事情。

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金华府金华县（今浙江金华）人，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明崇祯八年（1635）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崇祯十二年，29岁的李渔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未中，入清后无意仕进，把精力放在了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方面，后来居住在南京，把居所命名为“芥子园”，并开设书铺，编刻图籍，广结交官贵人、文坛名流。著有《凰求凤》《玉搔头》等戏剧，《肉蒲团》《觉世名言十二楼》《无声戏》《连城璧》等小说及中国最早的系统戏曲论著《闲情偶寄》。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稗村，别号南屏樵者，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洪昇生于世宦之家，康熙七年（1668）北京国子监肄业，科举不第，白衣终身。他是清代著名的戏曲作家，以剧本《长生殿》闻名天下，与《桃花扇》作者孔尚任齐名，有“南洪北孔”之称。因为在孝懿皇后忌日演出《长生殿》而被劾下狱，革去太学生的学籍，后来离京返乡，晚年生活穷困潦倒，在浙江吴兴（今湖州）酒醉后登舟，落水而亡。洪昇的戏曲著作有9种，除《长生殿》外，还有《回文锦》《回龙记》《锦绣图》《闹高唐》《节孝坊》《天涯泪》《青衫湿》《长虹桥》。现存《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两种，另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等作品传世。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以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或“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14岁考取秀才，后屡次参加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